

21-02

重庆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上)

8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邓颖超同志与饶国模同志合影
(一九五〇年在北京)

馬寅初為重大學生題詞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

碎身粉骨不必怕
只留清白在人間
顯忠兄留念

馬寅初題



(一九四四年)
馬寅初被捕出獄後在歌樂山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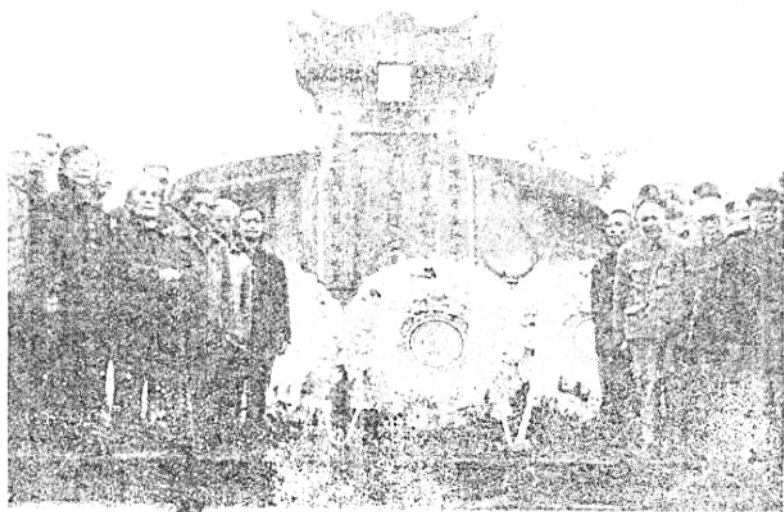


卢作孚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民生”
(一九二六年)

张培爵



省荣昌、荣隆、荣安、荣泰、荣和各界人士隆重举行

目 录

介绍一位渊博的学者和民主革命的战士

——马寅初老先生 许涤新 (1)

马寅初教授反对官僚资本的斗争 周永林 (6)

附：马寅初教授反对官僚资本的文章、讲演编目

怀念饶国模同志 钱之光 童小鹏⁶⁶刘昂 牟爱牧 (27)

蜀军都督张培爵 张泽孚 (35)

公孙长子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 王东伟 (72)

诗人吴芳吉 聂云岚 (89)

川剧《情探》的作者究竟是谁 李 丛 (95)

赵熙与《情探》 王抡煊 (99)

在卢作孚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候 周仁贵 (104)

我所知道的沈夕峰 张西洛 (125)

太虚法师生平片断 唐文光 (138)

回忆民生轮船公司 童少生 (145)

宝元通的组织管理及其转向国营的经过

..... 黄凉尘 樊陶斋 李清法 (179)

在卢作孚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候

周 仁 贵

一九三八年春，我由重庆民生总公司调到汉口分公司工作。

有一天，卢作孚先生叫他的随身侍应人员翁祥福，坐着汽车来对我说：“卢先生在民联船上，请你去谈话，马上就去。”

我当时莫名其妙，不知是什么事情，问翁祥福，翁祥福也说不知道。坐在汽车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民联轮停在汉口江岸，不经过围驳船就上去了。我上船看见卢先生坐在经理室，即上前喊了一声：“卢先生”。他一面叫我坐下，一面就和我谈起来了。

卢先生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任务非常艰巨，我虽然没有在公司了（那时卢先生是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水陆联合运输管理处处长），但对公司的若干问题，仍得从旁协助。因此，计划在汉口成立总经理室，以便与总分各部联系工作。总经理室的成员，我的亲友当中，有很多人为我推荐，我都谢却了。今天找你来，就是同你商量，想把你调到总经理室来工作。总经理室还有其他成员，你一个人是无法胜任的。你回去准备一下，把你现在的工作就交出去，我还要和陈国光经理（汉口分公司经理）说一下的。”接着问我：“有没有什么意见？”

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没有想到卢先生会如此器重我、信任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但又有些胆怯，害怕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我说：“只是能力有限，恐怕有负卢先生厚望”。

卢先生说：“试试看，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就会熟悉起来的”。

总经理室设在汉口江汉路民生分公司二楼上的一间小屋里，由袁子修经理负责。成员有王天循（现在美国经商）和我，还有一个曾任陕西榆林中学的中文教员（名字已忘）。王天循和那位中文教员，没有工作多久就离开了。

由于卢先生长住汉口，全公司的重心也移到汉口来了，重庆总公司四大处（总、船、业、会），每次寄来的航空信，就像四本厚厚的书，既要看来文，又要看顶批、然后拟稿，送核，缮发，几乎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袁子修经理起初帮助拟稿，后来只看文件，不搞具体工作）。另外，还要译来去的密码电报。我过去没有译过电码，译起来真感困难，一电尚未译好，二电三电又接二连三的到来，真是急死人！我当时感到天资低和无能而自卑。

这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广州香港的来往函电，因为南京失陷以后，当时民生公司所需船用油料（民生公司四十六条船中，有三十二条是烧油船）和五金器材、都要这时在香港广州大量抢购抢运，以备将来后方运输需要。记得那时在香港广州主持购运工作的是韦焕章、汤伟康和王世均。

卢先生为民生筹划在香港广州购运的油料和五金器材，先后共购运柴油四千余吨，润滑油数百吨，器材二千五百余吨。所需价款，曾向中中交农四行，定期两年长期贷款四百万元，又向金城银行贷款三、四十万元。这批贷款，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相

当大的数字。可是，后来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经过两年的时间，再来偿还这笔贷款时，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了。

储备这批油料，除用于武汉、宜昌撤退起了很大作用外，还弥补了民生公司在抗战期中的亏损，维持了后方的交通运输。为充实民生机器厂而储备的器材，也为维修和改建船舶，起了极大的作用。

要是当时没有储备这批油料、器材，武汉、宜昌撤退，就将因缺油而成为严重问题，成千上万的逃难人员和成千上万吨的轻重工业器材、航空器材、兵工器材……，就将无法转运入四川。幸赖卢先生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精心筹划，储备了这批当时国内不生产、全靠外国进口的油料、器材，才免使航行中断。这是卢先生为事业，为国家，作出的可贵贡献之一。

卢先生除了日夜为事业，为国家的交通运输操劳外，还经常到外面去作“救亡图存”的讲演。记得一九三八年的一个夏天，卢先生应邀到武昌战干团去讲演，战干团等候在大门口的负责人不认识卢先生，他见身穿派力司中山服、头戴巴拿马草帽、手抱公文皮包，神气十足的卢先生的随身侍应人员翁祥福，便以为那是卢先生，于是上前向翁问道：“请问，你是卢作孚先生吗？”翁有些不好意思，顺势将手一指，那人才知道穿着非常朴素，着芝麻布中山服的才是卢先生。

芝麻布中山服，又称“民生服”，当时民生公司的职员，规定一律穿着这种由北碚三峡染织厂出产的芝麻布服。卢先生当上交通部常务次长以后，也一直穿着这种制服。及到一九四四年赴美出席国际通商会议才改穿西服的。

我自到总经理室工作后，就没有星期假日，也无所谓上班下班，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就寝，毫不夸张的说，这

段时间的工作，是总经理室最繁忙、最紧张的阶段。

国民党政府，在“诱敌深入，转移新阵地”的借口下，武汉亦将弃守了！

总经理室人员，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撤退宜昌，卢先生本人则最后由汉宜公路撤走。当卢先生和袁子修经理用汽车送我和小闵（打字员，上海人）上民族轮，经过江汉关拐湾的途中，他故意对袁子修实际对我说：“子修呀！这段时间的工作，没有仁贵来帮忙，真是不堪设想”。这是卢先生从侧面对下级人员的鼓励方式方法。

二

到了宜昌，我们住在怀远路民生公司（解放后改为子弟小学）二楼上。宜昌分公司经理是童少生。

到宜后，卢先生的责任更大了，担子更重了，他要忙于策划抢运全国各地集中在宜昌的大量器材物资和成千上万的逃难人员，夜以继日的呕心沥血，为国操劳。

那时，从宜昌一马路起，直到现在的十三码头止，沿河两岸都堆满了器材，仅有极少数装了箱，其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赤裸裸的、乱七八糟的堆置在荒地上，你压我，我压你，已经全部生锈。而这些兵工器材、航空器材，轻重工业器材，约有八、九万吨，可说是国家之宝——国家仅有的一点元气。八、九万吨的数字，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些珍贵的器材物资，若一旦宜昌失陷，成为敌人的战利品、对抗战前途影响不小。

除此之外，人的问题也很严重。那时拥塞在宜昌的人，约有三、四万，只见遍街是人，惶惶不安。一怕敌机轰炸；二怕成为

俘虏，都争先恐后想法逃走。因此，所有轮船公司拥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交涉抢运器材物资的人争吵不休，轮船公司经办业务的人员，简直无法展开工作，只在口头上应付。

卢先生见着这些纷乱如麻的情景，首先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以及各轮船长、领江座谈。根据当时川江水位，估计较大船只尚可航行四十天左右（较大的轮船，枯水位不能航行，就要停航收班），即以四十天为根据，作出运输计划。计算有多少船参加运输，每船每天可运若干吨，其可运若干吨，都一一表列出来。估计结果，有把握能在四十天左右，基本上可以完成运输任务。当时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争取时间，缩短航程，增加运量，凡未装重件的船只，一般早发晚归，运进峡里卸了即回，不拉长线。

当卢先生对水位情况和运输能力摸清了底，便召集有关部门开会，把运输计划在会上宣布，说明有把握能在四十天左右，基本上可以运完所有器材物资时，大家都热烈狂呼，有的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接着卢先生又要求各交运单位，分别列出最关重要，次要的器材物资数字，以便分先后次序运输；并说明清单列出后，何单位的物资先运，何单位的物资后运，由他本人亲自掌握分配，各单位毋须催问。从此，各单位吃了“定心丸”，就再不争完恐后，再不相互争吵，秩序也就好起来了。

为了搞好抢运工作，卢先生还要求各交运单位，立即着手器材物资的整理，该装箱的装箱，该装上囤驳的装上囤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以便船一到港，立即装搬；同时，要求各船也同样作好准备，船未到港之前，即将舱门打开，舱盖揭开，吊杆绳索弄好，以免影响装船时间。船岸配合，非常默契。

另外，卢先生还作了坏的打算。万一因战事关系，不能按四

十天的计划完成抢运任务时，那些东西该抛弃的，都要各交运单位作好思想准备。并提醒各交运单位注意：凡运出去的机器设备，必须注意配套，以免运到后方，缺这缺那，成为无用的废铁。卢先生这些高贵的主人翁责任感，以及周密细致的思考，令人叹服！

卢先生除了策划好、安排好抢运任务外，还经常深夜到河下检查装戥工作，遇有困难问题，立即就地解决。装卸工人、船员，看见卢先生不辞辛苦，深夜到河下关心他们工作，深受感动，干劲倍增，只见沿河两岸，灯光耀眼，人声如潮，号子声，机器声，混合成为一曲雄壮激昂的歌声，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战斗夜景！

有一天晚上，卢先生照常到河下了解装戥情况，船员和工人们看见卢先生亲临现场指挥，干劲十足，对装戥工作，无形中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一位像是报关行的“老几”，他看见穿着朴素的卢先生，在现场指挥这，指挥那，不知他是何人而奇异，便从人群里挤出来，没有礼貌的问道：“喂！贵姓啰？”

“卢作孚”。那人听了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交通部的常务次长，啥话没说，灰溜溜地又从人群里消失了。这又是卢先生穿着朴素所引起的误会。

在卢先生的精心策划督导下，堆积如山的器材物资，拥挤的人群，终于按计划完成了抢运任务。这是卢先生呕心沥血，度过若干个不眠之夜，依靠广大工人船员，为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事后有人赞颂他这次策划抢运是：“奇迹”，实不为过。

参加这次抢运的轮船，共计二十四艘，除两艘外，其余皆系民生公司轮船。另有外国船数艘，因中立关系，只戥运商品，不戥运有关抗战物资。戥运商品，每吨收费三百元到四百元；而中国轮船戥运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三十元到三十余元，其他公物

只收运费四十余元，仅及外国轮船运费的十分之一。中国轮船公司，特别是民生轮船公司，对国家贡献之大，于此可见。

卢先生在宜期间，除了出色地完成抢运任务外，还主张民生公司购买一批大大小小的轮船，并进用了随船船员。卢先生主张购买这些船和进用这些船员的动机，主要是免使资敌，成为日本人的侵略工具。被收买的轮船，都是单车独舵，马力小，吃水深，无力入川的船只。这些船如果听其滞留宜昌，成为敌人的战利品，其船员为生活所迫，难免不被敌人利用。故卢先生决计将凡愿出售的轮船，都由民生收买过来，设法驶入川江；其随船船员，则悉数进用，由民生给以一定生活费用，免使流离失所。这是一项既避免敌人利用，又为民生未来发展，储备船员的两全决策。

由于卢先生主张购买这些过去航行宜河的船只，民生公司的轮船，遂由当时的四十六艘，发展到后来的一一五艘，这是民生公司发展最快的年代。

三

宜昌的抢运任务基本完成后，我们就回到重庆。这时，卢先生交通部的职务尚未辞去，总经理室不便设在公司里，是设在两路口的重庆新村。

回重庆后，总经理室成了人多事少，除我之外，记得还有朱榭屏、肖本仁（即肖林）、刘正勋、王心若等。我一面感到无事可干而苦闷，一面觉得搞文书工作有些厌倦，便与袁子修经理商量，请他转商卢先生，将我调到分部去，俾能锻炼自己，提高业务管理水平。但当时正是航线缩短，各分支机构的人员都撤到重庆，大有人满之患，一时没有适当机会调出去。

后来，泸县成立办事处，才把我调到泸县去。一九三九年

夏，日本二十七架飞机轰炸泸县，全城被烧光，我才被调上行船，最后又调到三斗坪办事处。

当战事节节败退，三斗坪受到威胁时，我又被调回重庆总经理室，这是一九四三年夏的事情。此时卢先生已辞去交通部次长职务了。

总经理室在朝天门仓库，成员有朱榭屏、肖崇尧和我，工作很少。那时，卢先生好像在准备出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忙于各处讲演，回到办公室的时间不多。

四

正在这时，江津利群银行聘我到綦江分行任经理，我欣然应聘。便写好长假条纸，托朱榭屏待我第二天离开重庆后，送呈卢先生。

当我回到白沙家里的第二天，由白沙班轮带来卢先生给我的亲笔信，信像电文那样简短，原信是这样的：

仁贵弟：希即来渝面谈一切。

作孚 ×月×日

我是卢先生的学生，应属晚辈，所以他对我客气以“弟”相称。

我看信后，知道是请长假的问题，便又返回重庆。

那时卢先生住的招待所在石板街，这也是他接待客人的地方，我便直趋招待所。适卢先生正在会客，等客人去后，他才与我谈话。

卢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要请长假？”

我说：“公司航线缩短，人多事少，我在公司里是一个负担。”

他说：“这许多人都负担了，就负担不了你一个人啦？”

接着又问：“你出去有什么打算？”

我才把应聘利群银行的事情告诉他。

他又说：“到一个新的环境去，何不如就在公司里？人是旧的好，你最好还是不要走。”说到这里，卢先生感从中来，潸然泪下，我也受到感染。

沉默一会，我说：“我已经接了利群银行的聘书，不便退回。卢先生！来日方长，报効有期，等到抗战胜利后，我一定回来。”

卢先生见我去意已坚，只说：“那也好”。

我辞去卢先生出来，回想他动感情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五

抗战刚一胜利，卢先生便叫人通知我，要我马上回民生公司。于是，我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又回到总经理室。

大概因我在银行系任经理职务关系，在我回到总经理室时，卢先生还主动为我升了一级——由原来的副主任升为视察。这是卢先生对我的关怀和鼓舞。

这时正是复员时期，卢先生的应酬函件相当多，各方面来函来人请求予以购买船票方便者，应接不暇，我除了忙于处理应酬函件外，还要代表卢先生接见客人。因此，我这段时间的工作，又有点像在汉口时那样紧张了，

抗战胜利后，卢先生对于民生公司的航运事业，有一个宏伟的远景规划，那就是：“不仅川江要以绝对优势来保持长期和平，免使不再发生惨酷的斗争，还得大力发展长江中下游，并视能力参加沿海和远洋运输”。这就是卢先生发展航业的心中蓝图。

此外，卢先生还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将有一个和平环境，外国到中国来旅游的人，将会络绎不绝。为了争取外国人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赚取外汇，必须订造一批设计新颖、造型美观的船只，来适应旅游者的需要。

卢先生的理想是这样，行动也是这样。于是，他于一九四六年冬，怀着兴奋喜悦的心情，前往加拿大洽订门字号轮船。

临行前，他召集主任以上人员讲话，勉励大家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之外，要多读书，要钻研业务，要全面掌握业务知识，提高业务管理水平，成为真正的航业内行，才能适应未来航业的发展需要。并叮嘱大家要集体活动，不要搞歪门邪道，要在星期日，集体参观，集体旅行，要开展各种球类运动；要把民生公司办成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事业。

大家听了卢先生的讲话以后，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情绪高昂，精神振奋。公司立即发起成立一个“新集体生活运动会”，还办了一个“业务训练班”，按照卢先生的意愿去办。

可是，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力的专人负责领导；一方面由于可能还有一些人，对于卢先生发展航业的心中蓝图不够了解，而对“才能适应未来航业发展需要”这句话重心长的话，也就体会不深，未能引起多大重视；再兼以民生公司在抗战期中所沾染的一些个人恶习，和一些歪门邪道风气，绝非这个“新集体活动”能够纠正过来的。因此，卢先生的临别赠言，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结果，“业务训练班”，有名无实；“新集体活动”，无影无踪。

六

卢先生雄心勃勃，怀着喜悦心情到达加拿大后，却受到了意

料之外的两大困难的冲击，以致焦虑着急过度，在原已患有“脉脾间歇症”的基础上，又加重了病情，危及生命。这两大困难是：

第一，为订造门字号轮船向加拿大银行贷款一千二百五十万美元（另外自筹二百五十万美元），国民党政府原已同意为借款作担保，可是（当时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从中阻挠，迟迟不予批准，以致时间延长，加拿大物价上涨，原已恰妥可建造十二艘门字号轮船，现只能订造九艘了。这是无形中的损失，卢先生真有切肤之痛！

第二，当时民生公司船只，半数以上在打差，每条船的差费是固定的。但燃料、五金和各种物价，却如脱缰之马，飞速上涨，差费固定了未随物价上涨不说，还不能按期付给。等到过期许久才把差费领下时，纸币已贬值成为废纸了！

差费不能如期结算和物价恶性膨胀的结果，造成民生财务上极大困难。不得已，只好函电向国外的卢先生告急，促其早归。卢先生见着这些雪片一样飞来的催归函电，忧心如焚，着急万分。

卢先生因为以上原因，于一九四七年春抱病回国时，愁容满面，这和他出国时的情形相比，真是高兴而去，败兴而归了！

七

卢先生一九四七年春回国时，起初住在重庆红岩村金城银行的宿舍里（家住在南京），刘润生经理和我也同时住进这里。刘经理熟悉医理，是专门来照料卢先生的病的。由于红岩村离重庆太近，每天来看望卢先生的人很多，来谈问题的也不少，这对他的病情是有一定影响的。为了避免这些干扰，使他早复健康，后